

# 因车祸离世 女儿帮他们捐献器官 一对矿工夫妇的十次重生

冬天来的时候，这对夫妇的名字会被刻进一片纪念碑林。明年春分，逝者家属和接受器官的重生者们都会相聚在此。根据捐献的“双盲原则”，他们不会知道对方的名字，感谢也无从说起。但他们会在这一片默默哀悼、送花、朗诵诗歌。

这是一场需要仰仗善意和运气的手术。2枚肝脏、4枚肾脏、2对眼角膜从一对夫妇的遗体中取出，运到了250公里外。特殊的告别后，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器官，在另外10人的身体中，有了重新运转的机会。

这是一对来自安徽的矿工夫妻，因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后，女儿们为他们做了这个并不容易的决定。“希望父母来不及做的事情，会有别人替他们完成。至少那两对眼角膜，能带他们看到更多风景。”



来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的人们。

## 热心的夫妇

今年6月3日，一个平静的上午。刘志强准备去矿上工作，妻子卢丽想去买点东西，二人便一起出了门。

十几分钟后，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一辆货车突然闯了过来。

发生意外的时候，二女儿刘梦佳在上班。6月3日上午11点左右，“妈妈”来电，她以为又要念叨让她好好吃饭。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陌生声音。“你爸妈出车祸了，快来！”刘梦佳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，浑身打战，立马赶去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。医生让她把家长叫来，刘梦佳带着哭腔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家长。”

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刘志强和卢丽躺在相邻的病床上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。每天只有10分钟探视时间。在那10分钟里，刘梦佳会帮父母捏捏腿，擦擦脸，握握手，说说话。

又过了一周，情况没有丝毫好转，甚至变得更糟。刘志强夫妇处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状态，医生希望家属可以接受病人无法再醒来的事实，同时提出了另一种“活着”的可能——器官捐献。

刘梦佳犹豫了很久，她试想，“如果他们知道，或许也会支持这个决定。”

父母有副好心肠。路上遇到骑三轮车上坡的老人，总忍不住上前推一把；矿上处了几十年的老同事，有需要都会来找刘志强搭把手；邻居们会和卢丽笑着打招呼，她们喜欢约在一起跳广场舞，卢丽身材高挑，留着长卷发，跳起舞来仿佛会发光。

这不是个容易的决定。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李春伟很理解这种感受，器官捐献要征求直系亲属的同意，哪怕有一个人不同意，也会终止捐献。过往的经验告诉他，这难免会和某些传统的观念相悖，比如“死者为大”，比如“完整地离开”。

## 两个和十个

父母宠爱的小女儿首先反对。车祸发生前两天，父母刚给她过了生日。卢丽举着手机，记录下女儿吹蜡烛的瞬间。那天买的荔枝还没吃完，冻在冰箱里。

刘梦佳懂得妹妹的不舍，意外来得太快，留下的遗憾太多。

干了几十年矿工的刘志强就快退休了，但一家人计划的“家庭旅游”还没能成行；父亲节快到了，姐妹三人还在商量给爸爸买哪个款式的衣服；刘梦佳期待着，不远的未来，父亲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教堂……

“之前没有做的事情，让别人来替他们完成吧。”刘梦佳终究还是说服了姐妹姐妹，“至少那两对眼角膜，能带他们看到更多的风景。”

6月15日上午，刘梦佳和家人一起签下器官捐献确认书。

在宿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，刘志强和卢丽的呼吸机被撤下，被宣告脑死亡。他们的身体被蓝色的布盖住，医生、护士和器官协调员围在四周，低着头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“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。”

父母走后，姐妹们把微信头像都换了。一张全黑的照片，点进去细看，会看到星星。她们相信“人死后会变成星星”，想念的时候，抬头就能看见。

因为车祸去世的捐献者，李春伟见过很多，“但夫妻俩同时捐献器官的，这是国内首例。”

两个小时后，器官获取手术完成。2枚肝脏、4枚肾脏、2对眼角膜相继被取出，装入特定的储存仪器，从宿州紧急送往合肥市。在那里，器官移植团队、手术室、麻醉科、输血科的专家紧锣密鼓地准备着。

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些器官将很快会进入10位患者温热的体内，重新运转。6位肝、肾衰竭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，4位眼疾患者能重见光明。

## 失而复得的眼睛

在刘志强夫妇逝世的那个雨天，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里，她等待的眼角膜正从250公里外赶来。

一周前，这位35岁的公务员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眼角膜穿孔，可能会永久失明，甚至伤及大脑神经。她还没习惯这种被打破的平衡。疼痛感从眼眶蔓延到脸部和头部，左眼的世界从“一层雾”慢慢变成“一张纸”，眼睛会不自觉地淌泪，走路时不小心就踩空。

眼科医生屈志国提议她更换眼角膜，但得到这个器官需要难得的运气。没有合适的眼角膜，医生也束手无策。

梁嘉欣是幸运的，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。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，皮肤黝黑，在建筑行业工作，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，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。5年前，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，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，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。到今年6月，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。

躺在手术床上时，孙思城一阵阵冒汗，手也紧张到发麻，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。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，这是他第一次做手术，隔壁病床的阿姨“嘲笑”他：“这么个大小伙子，怕啥呢？”

手术很成功，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，给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，是男是女，多大年纪。一天，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器官的新闻，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，他猜想，自己的“恩人”或许就是他们。

根据器官捐献的“双盲原则”，捐献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晓对方信息。但孙思城的父亲还是想跟医生打听一下，得知刘志强年纪与自己相仿，还有三个女儿。他担心孩子们会吃苦，“如果他们家有困难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们可以捐些钱。”

医生摇了摇头。父子俩又补了一句：“那祝她们健康，平安。”

梁嘉欣摘下纱布后，眼睛里的雾气散去。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，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“妈妈，人家为什么要吧眼睛给你啊？”

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？“他们去世了，但想帮助更多的人。”儿子又问：“那就是死了吗？”“对，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。”

## “万分之一”

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眼角膜要艰难。

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。刘志强夫妇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（简称“安医大一附院”），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。

他开了十几年货车，跑遍全国各地，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，饿了就去服务区吃泡面。两年前，刘大勇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。

车是彻底开不了了。刘大勇托人卖了那辆货车，家里女儿在上大学，儿子正读高中，吃穿用度都要花钱。妻子在老家寿县开了一个消夜摊，卖当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汤。夫妻俩常常从傍晚忙到凌晨。刘大勇帮着洗碗、端盘子，状态好的时候，他还能帮忙炒饭、炒粉，“大家都说我的炒粉好吃。”

等待是漫长的。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过程复杂，器官资源极度稀缺。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，截至2019年年底，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。捐献的器官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分配，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。

好消息在不经意间降临。6月15日晚，消夜摊刚开市不久。锅铲翻飞间，电话铃声响起，一看是医生打来的电话。

“有肾源了，你们想不想换？”电话那头的医生问。“换，肯定换啊，我们等了两年多了！”

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，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“万分之一”。

“我想喝水。”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。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，水是极奢侈的，有时候渴得不行了，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。

护士端来一杯水，刘大勇用吸管抽了两口，“那是重生的感觉。”

器官移植后，大部分患者的生活都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在接受刘志强夫妇器官的10名患者中，8人逐渐康复。但一名眼疾患者在移植后恢复不佳，无奈进行了二次移植，还有一名肝病患者不幸离世。

逢年过节，器官捐献协调员李春伟都会去慰问刘志强这样的捐献者家庭，他希望自己的出现，能告诉他们，“我们没有忘记，他们的亲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。”（新京报）

安徽大蜀山文化陵园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。